

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丛书主编 / 何志龙

清代学者名儒与
陕西地方志的修纂

王雪玲 / 著

 科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丛书主编 / 何志龙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 (09T003) 结项成果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点学科经费资助出版

清代学者名儒与
陕西地方志的修纂

王雪玲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学者名儒与陕西地方志的修纂 / 王雪玲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12

(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ISBN 978-7-03-047018-8

I. ①清… II. ①王… III. ①地方志—编辑工作—研究—陕西省—清代 IV. ①K29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8362 号

责任编辑: 陈 亮 任晓刚/责任校对: 彭 涛

责任印制: 张 倩/封面设计: 黄华斌 陈 敬

编辑部电话: 010-64026975

E-mail: chenlia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7 3/4

字数: 310 000

定价: 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丛书总序

在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是一般教师关注的主要对象，教师们不仅关注自身的教学与科研，也关注他人的教学与科研，但对于学校和学院，高度关注的则是学科，即我们通常讲的学科建设。所谓学科建设，一般包含学科平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学科平台建设，主要指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设置和建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设置和建设，另外也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设置和建设，以及其他各类研究平台的设置和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主要指师资队伍规模、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等方面。科学研究，主要指师资队伍成员从事学术研究所产出并公开发表和出版的学术论文、著作以及研究报告等。人才培养，主要指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所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质量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和社会各行业的影响。学科建设的四个方面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学科建设的有机整体。其中，学科平台是基础，有了学科平台，有利于引进人才和加强队伍建设，有了学科平台，才能招收研究生，进行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是核心，拥有一支合理的师资队伍，才能支撑和维持学科平台，才能有进行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主体。科学研究是关键，科学研究的成果体现学科平台的力量，也是培养人才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人才培养是目标，人才培养必须依托学科平台，同时，人才培养不仅必须要有师资队伍，而且必须要有具备科学研究能力的师资队伍，才能完成合格的人才培养。

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历史学科一样，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建设，在2012年之前，主要进行的是学科的外延建设。所谓外延建设，就是指增加学科的数量和规模，如拥有几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几个国家重点学科以及几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综合国力的



增强，民众对高等教育有更高期待，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发展道路，高校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学科建设的重点由外延建设转向内涵建设。外延建设主要强调量，而内涵建设则更加注重质，外延建设为内涵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已有学科平台的基础上，凝练高水平的队伍，产出高水平的成果，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将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而统领这三方面的正是学科特色。凡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大学的特色集中体现在学科特色上。所谓学科特色，主要指在某一学科的某一领域，凝练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团队，产出一系列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同时培养出一批在学术界和相关行业有影响的人才。为什么说学科特色是学科内涵建设的灵魂，原因有三：一是从人力资源配置看，很难有一个高校有能力支撑一个学科（一级学科）所包含的所有学科领域。二是从财物资源配置看，很难有一个高校有能力支持一个学科（一级学科）所包含的所有学科领域发展所需要的财力和物力。支持学科建设不仅要有研究团队，而且要有为研究团队提供从事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财力和物力，如从事历史学研究所必需的场所设施、网络环境和图书资料等，只有满足人、财、物的合理配置，才能进行科学研究。三是只有发展学科特色，资源配置才能实现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如果学科领域广泛，需要配置的文献资源也必然广泛，相应地如果学科领域相对集中，需要配置的文献资源也相对集中，成本低而利用率高。另外，发展学科特色，易于承传学术传统，易于形成内部合作，易于产出系列成果，易于团队培养人才，易于形成学术影响，也易于保持学术影响。

发展学科特色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作为历史学科建设，要充分考虑地方历史文化，形成自己的学科优势，这种优势既能更好地服务地方，也能充分彰显自己的学科特色。要注重已有学术传统，顺应国家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着眼未来，长远规划学科特色。要充分考虑学校的实力地位，谋划学校能够实现的规划，因为学科建设规划只有在人、财、物的可持续投入基础上才能实现。

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依托地处周秦汉唐历史文化中心，考古资源丰富，出土文物规格高和数量大的优势，经过几代历史人 70 多年的不懈努力，逐步形成了以周秦汉唐历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科特色，中国古代史国家重点学科的获批，也是对这一学科特色的充分肯定。随着国家对历史学科精细化分类管理，原来既是门类也是一级学科的历史学一分为三，调整为中国史、世界史、

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根据学校地位的变化和学校对历史学科人、财、物的持续投入状况,面对三个一级学科的评估和建设,在国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思路必须明确,决策必须正确,行动必须快捷。环顾国内外高等院校学科建设成功者,无不具有显著特色。我们在学科内涵建设中,特色发展是唯一选择。作为中国史一级学科,其统属的中国古代史和历史地理学两个国家重点学科,是我校的特色学科,也是我校的优势学科,在国内学科建设的激烈竞争中,只有加大建设力度,才能保持优势地位。而要保持传统优势学科的地位,除了加大已有建设的力度,还必须不断探索新的学科增长点,才能进一步强化学科优势,彰显学科特色。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发展的大战略,为地处丝绸之路起点的我校历史学科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学院“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不仅顺应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同时也是我院探索新的学科增长点的体现。中国史升格为一级学科后,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势在必行,而从时间和空间上看,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样极为广泛,我们也必须选择某一领域,重点建设,特色发展。西北地区的近现代史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西北地区的近现代史作为我校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方向,同样具有明显的地域优势,也必将成为我校的学科特色和新亮点。

此外,文物与博物馆学也是学院谋求学科建设发展特色的一大发力点。2008年1月23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根据该通知,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全部实行免费开放,博物馆已成为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基地。在全国范围内,博物馆如雨后春笋,发展迅猛,但博物馆学的专业人才却明显不足,这就为高等院校博物馆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陕西是考古大省、文物大省,更是博物馆大省,博物馆的人才需求也相对较大。基于地缘优势和省内学科建设差异化发展的思路,我校在考古学学科下重点发展博物馆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陕西省文物局与我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国家文物局在我校设立文博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充分说明我校重点发展博物馆学符合陕西省和国家对博物馆人才培养的需求,特色建设博物馆学的思路得到了肯定和支持。我们将在国内博物馆学研究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吸收国外博物馆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探



索努力构建我国博物馆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彰显我校博物馆学的学科特色。

彰显学科特色的要素很多，但产出颇具影响的系列研究成果尤为重要。为此，学院设计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本丛书首批 17 本，均为学院教师近年新作，每本书的内容不少于三编，作者自序。丛书的内容广泛，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希望通过出版本套丛书，集中展现学院教师近年来学术关注的领域和成就。鉴于本丛书是在我校大力推进一流学科建设的开启之年规划完成的，故以一流学科建设的思路代为本套丛书之总序。

何志龙

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文汇楼 C 段 209 室

2015 年 12 月 25 日



前言

地方志既是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它是记载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地理、文化、学术、物产和民情风俗的综合性资料，是研究区域历史、地理及学术文化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我国地方志的修纂历史悠久，数量浩繁，其中清代又是地方志修纂的全盛时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远超前代。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清代地方志 5685 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总数的 70%，其中不乏名志佳乘。陕西作为清代开始修纂方志较早的省份之一，不但数量居于全国前列，而且由于学者名儒的广泛参与，质量上也可圈可点，特别值得关注和肯定。此外，就目前陕西省各大图书馆馆藏古籍而言，清代地方志允为大宗，这些地方志是反映清代陕西各地自然景观、人文状况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特色文献，是研究陕西区域历史文化最直接、具体的资料，整理、研究并利用这些方志文献无疑是历史工作者的任务之一。

对我国地方志的整理与研究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展开，在陆续整理出版旧志的同时，也出版了大量关于方志研究的论著。朱士嘉是卓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其所编《中国地方志综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等工具书为学术界研究地方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及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成立，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新志的编纂当中。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旧志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各地馆藏旧志先后编集了目录，一些重要或罕见、稀见旧志也陆续点校或影印出版。就方志研究而言，虽然出现了诸如朱士嘉《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黄燕生《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陈捷先《清代台湾方志研究》、巴兆祥《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等论文和专著，但总的来说，研究的重点仍在旧志的整理出版和新志的编纂及体例、方法等内容的探讨方面。具体到陕西省，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长期以来，旧志的整理和研究一直得不到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方志系统



在新修地方志的同时，启动了旧志的整理出版与开发利用工作，陕西省也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旧志，先后刊布了《陕西地方志书目》、《陕西地方志联合目录》等油印本，取得了一些成绩。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地域文化的研究愈来愈受重视，作为研究区域历史文化重要载体的地方志亦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相较而言，陕西学界对旧志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迄今为止，尚未见一部正式出版的陕西旧志书目，更遑论提要式或综论性的著作。研究方面虽有高峰《陕西方志考》、郭鹏《汉中地区历代志乘述略》等成果，但高水平的专门性著述仍属鲜见。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存在的问题也很多，《陕西地方志书目》（稿本）错收、漏收乃至各种谬误不一而足，《陕西方志考》之疏失依然存在，凡此都说明目前学术界对清代陕西地方志的修纂情况不够重视。

2000年以来，整理出版旧志成为一大趋势，就陕西省而言，2004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2007年凤凰出版社又影印出版了《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均以清代方志为主，成绩斐然。与此同时，陕西各界积极配合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有序地展开核查、统计、著录本省各地馆藏古籍，其中旧志数量最大，此项工作的进行有助于了解陕西旧志的数量、刻本及藏地等情况，也为旧志的研究利用提供了便利条件。随着近年来学术界愈来愈重视对出土文献及典藏文献的挖掘与利用，作为研究清代陕西社会发展及变迁的地方志更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因此清修陕西地方志的研究不但必要，而且在当前开发西部及建设文化强省的背景下也显得尤为迫切。

清修陕西方志数量浩繁，种类齐全，内容丰富，在继承前代修志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方志体例日臻成熟，修纂方法日益完善，尤其是清代名人修志蔚然成风，一批学者名儒加入到陕西修志的大潮中，为陕西方志增色不少，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陕西自古就有名人修志的传统，西晋裴秀撰有《雍州记》，潘岳撰有《关中记》，唐人韦述撰有《两京新记》，北宋宋敏求撰有《长安志》均为名人名志。时至明、清，名人修志更是层出不穷，有学者认为，“明清时代陕西学者的突出贡献主要集中在方志学领域”^①，此论有失偏颇，如果说明代陕西方志修纂以本土著名学者为主，清代则恰好相反，流寓陕西的外籍学者名儒纂修方志成为主流。被人津津乐道的明代“关中八志”均出自本土学者

① 秦晖、韩敏、邵宏谟：《陕西通史·明清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86页。



之手，其中《武功县志》的纂者系武功人康海、《朝邑县志》的纂者系朝邑人韩邦靖、《高陵县志》的纂者系高陵人吕柟、《鄠县志》的纂者系鄠县人王九思，他们都是名扬天下的陕西籍学者，均以自己的才学修纂家乡方志。有清一代，本土著名学者修志数量聚减，而流寓陕西的外籍学者加入到陕西方志的修纂大潮中，贡献不可谓不大。民国时陕西兴平人冯光愚在叙述陕西方志变迁时说：

往者新城王文简公云，明代名志多出秦，诃人口者约十种，而《武功》、《朝邑》为之最，《四库提要》亦谓其简括有法。间尝取其书读之，信乎其辞之洁也。亦越有清，秦中方志率成于乾隆之时，盖其时国家既重熙累洽，而毕镇洋以宏达抚陕，洪北江、孙渊如、刘长明^①之伦悉居幕府，敷政之暇，搜碣碑以订金石，稽掌故以续文献，故关辅志乘多成于斯时。而孙志醴泉，洪志淳化，尤与古作者合符而后来者称述焉，洵可谓一时盛轨已。嗣是固始蒋子潇以朴学大师主关中丰登讲席，先后成同州、三原^②、泾阳志，考核详审，世推佳制。……盖明代方志多失芜滥，故康、韩矫之以峻洁，清自屡开鸿博，崇尚考据，故诸作多趋于博丽，虽繁简不同，然其为佳构则一也。^③

足见名人修志在陕西方志修纂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清修陕西方志承上启下，尤其是学者名儒广泛参与修志，在体例、内容、修纂方法等方面对近代方志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清代学者名儒的广泛参与也值得今天方志工作者借鉴。因此，研究清修陕西地方志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清代地方志的价值，同时对于新修方志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充分利用实录、史传、碑志、文集、年谱、方志等资料，在综合考查清代陕西地方志的修纂历程、数量、质量等问题的基础上，梳理清代学者名儒在陕西的学术活动及方志修纂情况，总结其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在清修陕西地方志中所起的作用及对旧志的体例、内容带来的影响，进而探讨这些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研究陕西地方志的修纂及陕西历史文化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及理论依据。

① 按：当为严长明，疑原文有误。

② 按：蒋湘南流寓陕西期间先后纂有《蓝田县志》、《泾阳县志》、《留坝厅志》、《同州府志》以及《华岳图经》等志书，似未见三原志，疑此处有误。

③ （民国）《潼关县新志·冯光愚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181页。



目 录

丛书总序	i
前 言	v
第一章 清代陕西方志修纂概况	1
 第一节 清修陕西地方志的数量	2
第二节 清修陕西方志的历程	4
第三节 清修陕西方志的种类与名称	18
第四节 清修陕西地方志的质量与价值	24
第二章 学者名儒与陕西方志	27
 第一节 学者名儒修纂方志是清代的一大特色	27
第二节 学者名儒修纂陕西方志集中在乾隆朝	35
第三节 嘉道朝是学者名儒修纂陕西方志的延续	38
第四节 学者名儒在陕西方志修纂中的作用及影响	40
第三章 孙景烈与陕西方志	43
 第一节 关学传人孙景烈	43
第二节 孙景烈与陕西方志的修纂	60

第四章 毕沅与陕西方志 66

- 第一节 毕沅其人 66
- 第二节 为政陕西，造福三秦 70
- 第三节 整理编纂陕西地方文献 78
- 第四节 毕沅与陕西传统地志的修纂 83

第五章 洪亮吉、孙星衍与陕西方志 93

- 第一节 洪亮吉与陕西方志 93
- 第二节 孙星衍与陕西方志 117
- 第三节 洪、孙同纂《澄城县志》 128

第六章 蒋湘南与陕西方志 135

- 第一节 蒋湘南其人 135
- 第二节 蒋湘南与陕西的不解之缘 137
- 第三节 蒋湘南与陕西方志 142

第七章 其他学者与陕西地方志的修纂 152

- 第一节 严长明与《西安府志》 152
- 第二节 严如煜与《汉中府志》 160
- 第三节 钱坫与朝邑、韩城二县志 177
- 第四节 陆耀通、董祐诚与陕西方志的修纂 186
- 第五节 吴泰来与《同州府志》、《蒲城县志》 196

第八章 清代学者名儒与陕西特殊地志 200

- 第一节 胜迹志 200
- 第二节 山水志 206
- 第三节 金石志 213
- 第四节 书院志 224
- 第五节 乡土志 227

参考文献	230
附 录	240
后 记	270

第一章 清代陕西方志修纂概况

清代是我国地方志修纂的全盛时期，早在清王朝建立之初，基于开疆拓土和加强统治的需要，清政府“急需掌握各地钱粮人丁、山川地理、兵防险要、风俗人情等佐治资料”^①，因此大力倡导修纂地方志，各级政府也积极响应朝廷号召，修志活动陆续展开。顺治年间，全国各地就修纂了一批有影响的方志，至康熙、乾隆年间，全国上下掀起了修志大潮，嘉庆、道光以后，清政府的统治虽然日趋没落，但修志传统始终不绝如缕。陕西省虽然地处内陆，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但在修纂地方志方面并不逊色于经济、文化发达省份，也是清代开始修纂方志较早的省份之一。因此，可以说清代陕西方志的修纂几乎与全国方志同步展开，修成较早的有顺治四年（1647）的《白水志》和顺治六年（1649）的《澄城县志》，之后各地方志陆续修纂，现存顺治朝所修陕西方志多达 20 余种，这些志书有些是在旧志的基础上重修或续修，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无旧志可参考的情况下新修的。康熙元年（1662），以修纂《河南通志》而闻名的贾汉复移任陕西，开始仿《河南通志》的体例修纂《陕西通志》，康熙六年（1667）始告完成。“《河南通志》和《陕西通志》是最早完成的两部清代通志，两书的告竣，既为各省编纂通志树立了样板，也为筹编一统志做了准备”。^②

随着全国统一局面的基本形成，清政府着手纂修一统志。康熙十一年（1672），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请求修纂《大清一统志》，康熙帝下令相关部

① 金恩辉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 年，第 162 页。

② 黄燕生：《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来新夏：《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附录》，合肥：黄山书社，1988 年。

门议奏，要求各省分别修纂通志，然后汇为大清一通志，康熙帝采纳了卫周祚的建议，“诏天下直省、府、州、县咸修辑志书，于是直省有司各设馆，饬禀高才生以从事”。^①“《大清一统志》形成定议后，整体程序是：从朝廷到地方，自上而下逐级谕令修志，并颁布《河南通志》、《陕西通志》款式，依照纂修；州县志成而修府志，府志成而修通志，自下而上，逐级汇纂，最终修成《大清一统志》”。^②可见清代康熙年间始修《大清一统志》，直接推动了全国各级方志的修纂，也激发了地方官、士绅、学者修纂方志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在这个文化大潮的影响下，陕西各地也展开了大规模地修志活动，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时期，直至宣统年间，方志的修纂一直未曾中断过。因此可以说，清代陕西省地方志的修纂几乎与全国相始终，康熙、乾隆年间两次步入高潮，尤其是乾隆年间学者名儒的广泛参与，不但提高了志书的质量，在理论建设及方志体例、修纂方法等方面也多有创获，为之后的方志修纂奠定了基础，成为清代全国修志的一个缩影，无疑是了解清代全国旧志修纂的一个窗口。

清代陕西修志是全国地方志修纂大潮中的一大支流，与清朝历史相始终，与时代风气相呼应，自始至终都与清修全国旧志密切相关。清修陕西方志数量众多、品种齐全，除传统官修的通志及府、厅、州、县志外，还有众多私修的胜迹志、山水志、金石志等特殊地方志，而在清末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产生的乡土志又为陕西旧志增添了一个新的种类。这些旧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也是陕西乃至全国旧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翔实地记载清代陕西政治、经济及文化的重要地方文献，是研究陕西区域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重要载体。

第一节 清修陕西地方志的数量

我国地方志的修纂历史悠久，数量浩繁，其中清代又是我国地方志修纂的全盛时代，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修于1949年以前的旧志共计8246种，其中陕西省是修纂旧志数量较多的省份之一，共计401种，位居四川、

①（康熙）《镇江府志·张九征序》，康熙十三年（1674）刻本。

② 乔治忠：《〈大清一统志〉的初修与方志学的兴起》，《齐鲁学刊》1997年第1期，第115—122页。



浙江、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江西、山西之后，与湖南省并列全国第9位。^①数量惊人的全国旧志，其中有70%修于清代，多达5685种。同全国旧志一样，清修陕西地方志作为陕西地方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陕西旧志中所占比例也很大，如台湾成文出版社所出《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陕西省》共收入陕西地方志118种，其中清人修纂91种，约占77%；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所出《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共收陕西地方志172种，其中清人修纂131种，约占76%；仅从这两组数字就可见清修陕西方志在陕西乃至全国旧志中所处的地位。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清修陕西地方志的数量，迄今尚未见精确的统计数字，各家说法不一。高峰《陕西方地考》中指出，“清代的陕西地方志和全国一样，已发展到极盛时期，整个清代陕西共编纂地方志二百八十五种，就数量而言是明朝的七倍，是宋元两朝的四十倍；就内容和体例而言，已确立了方志学的完整体系。”^②易雪梅、李淑芬《西北地区方志概述》承袭此说，认为“有清一代，西北五省区均编有志书，其中以康熙、乾隆、光绪三朝纂修的方志为多。据不完全统计，现存陕西方志285种，甘肃156种，青海10种，宁夏19种，新疆80种。”^③毋庸置疑，清代陕西省所修方志数量在西北地区居于首位。而秦德印先生在《陕西地方志书目·编者的话》中说：“清代我省编修的地方志流传至今的有三百一十二种。”^④《可爱的陕西·陕西的方志学》则言：

清代陕西方志修纂进入全盛期，现存者多达314种。一些文化发达的县份修志，已远远超过了清朝规定的60年一修之制，如泾阳县志清代即修了7次，在全国也属罕见。清志不但数量多，而且每部篇幅也越来越大。但这时志书多属官修，质量欠佳，多为拼凑而成的“官样文章”。不过也出现了一批由著名学者主编的学术价值较高的佳作，如乾隆四十八年洪亮吉编纂的《长武县志》，乾隆五十年孙星衍编纂的《三水县志》以及上述二人合纂的《澄城县志》等。^⑤

以上统计无外乎两个根据，其一是《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据笔者统计，

① 周迅：《中国的地方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0—21页。

② 高峰：《陕西方志考》，内部资料，1985年，第7页。

③ 易雪梅、李淑芬：《西北地区地方志概述》，《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第62—66页。

④ 秦德印：《陕西地方志书目》，西安：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室，1985年油印本。

⑤ 韦建培等撰：《可爱的陕西》，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7页。



此目录共计著录清代修纂的陕西地方志 289 种。其二是《陕西地方志联合目录》，此目录共计著录清修陕西地方志 322 种，只不过在这两家目录的基础上各家统计稍有出入。此外，影响清修陕西地方志数量统计不够精确的原因尚有多种，首先，作为统计依据的两种书目均成书于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限于人力、物力及技术手段，统计难以周全在所难免；而且两种目录统计都以现存方志为对象，且多有疏漏，尤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为甚。其次，两种书目在著录地方志时并无统一标准。例如，《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凡例》中就明确提及，“本目共收录我国历代地方志八千二百余种，收录范围包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凡具有方志初稿性质的志料、采访册、调查记等均予收录；山、水、寺庙、名胜志等不收录”。^① 秦德印《陕西地方志书目》收录宋、元、明、清、民国等历代编修的方志 442 种，作者在《编者的话》中说：“本书目只收录了地方志，对古迹、寺庙、园林等专志以及山水志、金石志等均未收录。”^② 因此要精确统计清修陕西地方志的数量，首先需要对旧志的概念及收录范围作出界定。有幸的是为了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级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及民间所藏古籍情况，2007 年，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对登记的古籍进行详细清点和整理编目，利用“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平台”建立全国古籍普查基本数据库。在古籍普查登记的基础上，由省级古籍保护中心组织本地区各古籍收藏单位编纂出版馆藏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形成《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目前，陕西省古籍普查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各地馆藏古籍目录也陆续出版，精确统计清修陕西地方志的数量当指日可待。

第二节 清修陕西方志的历程

有清一代，陕西省地方志的修纂与全国一样如火如荼，仅从清修陕西地方志的数量即可看出清代陕西修纂方志的盛况，虽然清初即有方志 60 年一修之政令，但整个清代修纂方志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政府所要求的那样整齐划一，就陕西省而言，有清一代方志的修纂不曾中止，亦有高潮也有低谷，其数量、质量、

①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② 秦德印：《陕西地方志书目》，西安：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室，1985 年油印本。